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李玉明

大同华严寺史话

赵一德 著

“大同华严寺”是辽金古刹。契丹人一上手就是为了给他们的祖宗设立“宗库”而建的,表现为一种“寺庙文化”。当时称“大华严寺”,规模宏大。后历经焚毁,仅存部分遗迹,遂分割而为今天的上华严寺和下华严寺。



引子	(1)
一、大华严寺分上下	(2)
二、辽金两朝寺庙开	(8)
三、蒙元明清皆修缮	(20)
四、北魏隋唐奠基哉	(22)
五、下寺庋藏《契丹藏》	(35)
六、上寺共挟五如来	(40)
七、几则花絮点睛笔	(46)
八、后人何妨畅心怀	(47)

引子

人们都知道大同的华严寺现在有两座,分别称为上华严寺和下华严寺,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实大同华严寺不止这两座,在旧城东关还有一座小华严寺,在城郊口泉也有华严寺,只不过都已或残或毁。怎么大同城有这么多的华严寺?再加上云冈石窟有《华严经》的韵味,善化寺还有“华严三圣”的塑像,是不是大同就是一座“华严寺”之城?更或者就是一处“华严圣地”呢?别误会,不是这样。与其说大同是“华严世界”,倒不如说,大同是“华藏世界海”中的一方佛陀与皇帝共享烟火的净土,是“人神合一”的“极乐世界”。

这里所说的“大同华严寺”是辽金古刹。契丹人一上手就是为了给他们的祖宗设立“宗庙”而建的,是一种供奉佛陀与祭祀祖宗于同一个寺院的设置,表现为一种“寺庙文化”。当时称“大华严寺”,规模宏大。后历经焚毁,仅存部分遗迹,遂分割而为今天的上华严寺和下华严寺。遗迹保存至今约千余年。1965年,国家列该两寺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今莅临华严寺,既能被上华严寺的雄伟所震慑,又能为下华严寺的玲珑所折服。此中的感染力不仅在于建筑和雕塑,更重要的是它蕴涵着辽金的历史和文化。今天,虽然那种祭祀祖宗的宗庙气氛没有了,但是佛教的文化氛围还存在,我们只能从佛教的气味中领略当年那种“佛帝共庙”的特殊形式了。可每当你留心寺内的遗碑时,就立刻会

被吸引。你必然要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告诉你,那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化。它就叫做“寺庙文化”。

所谓“寺庙文化”,就是“佛寺”与“宗庙”的合一。那是一种“帝王”与“佛陀”共同在一座寺庙里共享人间香火的特殊景观。这种景观,无论在佛教文化中,还是在宗庙文化中,都是罕见的;在中国各地也很难找到相同的例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同的这种“寺庙文化”,可以说有相当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是创始于另一个东北的古老民族鲜卑人,当年在他们执政的北魏时期,就在平城的五级大寺内为他们的祖宗塑造了五尊“丈六金像”,开创了在佛寺中供奉祖宗的先例,表现出了东北古代民族的一种奇特的宗教意识形态。后来这种文化还被东北民族契丹人和女真人所继承,于是出现了辽金时期在大华严寺内“奉安诸帝石像、铜像”的再创造,从而使这种文化根深蒂固地在大同荏苒存在了千余年。这三个民族,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王朝,都统领过中国半壁江山,又都最后融入大汉民族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成分,共同构建了中华文化。大同华严寺记录了这份文化,而且保留了下来,它真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一回就顺着这个问题说说。

一、大华严寺分上下

(一)上华严寺

上华严寺给人的印象是雄伟庄严。无论总体布局,还

是主体建筑,都有一种恢弘的气势。

特别是那座具有代表性的“大雄宝殿”,高踞于“丈二高台”之上,大有一派“不可一世”的架势。该殿东向,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举高 30 米,总面积(54×30)1600 余平方米,与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并列为国内现存最大的佛殿。最近于 1997 年至 2001 年落架大修,更呈英姿焕发之态,今天的外观状态,仍然保留着辽金的建筑风格,气势依然咄咄逼人;殿内的布置,也保留了明清内容,色彩依然金碧辉煌。极具观赏与研究价值。

该大雄宝殿梁思成先生已鉴定为“金建筑”。经过这次落架大修,可以进一步明确该殿的起始建筑年代是金天眷三年(1140),落成年代是金皇统四年(1144)。这个说法有两点根据:一为大雄宝殿的梁上题记“维金天眷三年岁次庚申闰六月癸酉朔十二日甲申戊辰时重建记乾元亨利贞吉”的字样(此题记写在当心间脊枋下木牌上,牌长 553 厘米、宽 20 厘米。1953、1955 年大同市作文物调查时已经发现);同时在北次间四椽枋上还发现有墨书题记“维皇统四年五月四日”的字样(系用毛笔直接写在椽枋上的),乃是准确的落成之日。记录着该殿是自 1140 年至 1144 年共经历了五年而完成的。二为《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碑文有云:“至天眷三年,闰六月间……乃仍其旧址,而特建九间、七间之殿……”文中的九间之殿就是今天的大雄宝殿。两项文字记载完全吻合,所以确认今存的大雄宝殿,始建时间为天眷三年闰六月,应无疑议。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见解,认为“天眷三年”之“重建”,

和“乃仍其旧址”的“特建”，都说的是对辽代旧殿之“重建”。而且在最近这次落架大修时，也发现了南墙内大柱有焚烧过的痕迹，从而认为辽代在这里已经建过大殿。这种见解不无道理，而且影响甚大。究竟重建的旧址是不是辽殿？正是这本《史话》要说的焦点问题。笔者是不同意这种见解的。

因为，有几个问题不能解答：(1)台基问题：今存大雄宝殿最显眼的是个丈二高的台基，无论是《营造法式》，还是辽建遗迹（如应县木塔、义县奉国寺），都没有这样高的台基制式。为什么华严寺就出现了如此突出的台基？它究竟是什么“旧址”？(2)高塔问题：金灭辽之“西京城西高塔争夺战”的那个“高塔”在哪里？这个台基，是不是那个“高塔”的台基？(3)大殿着火问题：仅凭焚烧过的残柱判断是辽建，不准确。只能是辽殿着火，而不能是金殿着火吗？其实也很清楚，若系辽殿大火后重建，就不会留下几根焚烧过的残柱，而且也不会没有文字记载。所以焚烧的残柱，只能说明天眷三年之后大殿南部着过一次小火，而不能证明是天眷三年时对大火烧过的旧殿之重建。如此种种都是过去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一旦解决了，就恍然大悟。下面慢慢道来。

大雄宝殿内部的佛像与壁画，则是明清遗物。正面的五尊坐佛（中间三尊是木雕，外侧两尊是泥塑），大殿两侧的泥塑二十天王立像，是明代补入的。殿内四壁壁画，计有870余平方米，东壁角下有墨书题记“光绪十六年（1890）大同钟楼西街兴隆魁董画铺信心弟子画工董安”字样，是为清

末所绘。可是这次揭修壁画时,发现在清代画后面还有一层绘画,颇似明代风格,说明现存清代壁画是后加的。因此,殿内的佛教文化是明清时代的,已非金代原貌。从明清遗留的佛教内容来看,塑像有禅宗遗韵,而壁画则是华严一派。

上华严寺的总体布局,有一派中心地位的气度。沿大雄宝殿之东向,试画一条中轴线:由殿门起,下高台,过天王殿,出山门,穿越百米通道(今上寺东巷),到舍利坊东街(今下寺坡街),方才抵达原大华严寺之山门。俨然百米两侧所有建筑,是它的左右两翼,下华严寺仅仅是它的右翼(南),而左翼(北)现在已经全部消失了。其实这个左翼正是宗庙的所在地,辽代为“石像、铜像殿”,金代为“七间之殿”是按古制“左祖右社”布置的(这些后面详述)。其规模仅次于“大雄宝殿”(九间之殿)而大过“薄伽教藏殿”(五间之殿)。只因为它是“宗庙”,改朝换代时,自然便成为首当其冲的拆毁对象,而且拆了个干干净净,所以这个地方的遗迹“荡然无存”。沿中轴线两侧,按《金碑》记载,当年应该还有“会经楼”、“钟楼”等建筑,所以这一带中心地区的建筑是相当壮观的。这就是辽金时期上华严寺范围内中心区的复原景象。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的确大不相同。

(二)下华严寺

下华严寺的代表是薄伽教藏殿,在大华严寺中建殿最早,资格最老,辽建的风格十分突出,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今天为大同市博物馆所在地。

而今莅临该寺,可以看到它的山门临街(下寺坡街),寺亦东向。进山门而西,沿中轴线直指天王殿,其背后正对内院门,入门达内院,是一所精巧而幽雅的“禅院”,院西尽头有“九尺高台”,拾级而登则至“薄伽教藏殿”,是为该寺之主体。

薄伽教藏殿,以其敦厚端庄的辽建风格而引人入胜。1987~1990年落架大修,有椽伏底部的题字:“维重熙七年岁次戊寅九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吉)时建”,可以确定其准确的落成年份是重熙七年(1038)。是保留至今难得的辽代建筑。该殿建在九尺高台之上,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总面积(约 25×20)500平方米,是一座端庄而玲珑的佛殿,其功能自始至终是一所“藏经殿”,即佛教图书馆。这里更为引人注意的还是那个不合制式的台基(这一点后文详述)。

薄伽教藏殿内,中央砖台佛坛之上为彩塑泥像共计31尊。正中三尊为主佛(这三尊主佛是什么佛,至今还有争议。后文讨论)。主佛两侧有四大菩萨;主佛前面有十二胁持,还有供养童子等;佛坛外四角有四大天王。这一堂精妙绝伦的泥塑群像,首先给人以美的享受,它们的确是太美了,特别是那一尊亭亭玉立的“合掌露齿菩萨”,不是早已蜚声海内外而令人心动了吗?于是现在给它们冠名曰“辽塑”,而成为下华严寺的骄傲(不过是不是辽塑还需要讨论)。其次则是让人们思考那一眼看不透的佛教内容,这一组群像到底是在干什么?现在有好几种说法,比较令人满意的说法是“佛说法图”,仔细看来果然如此:佛在深沉地说

法；大菩萨在静静地听讲；众弟子在以各种神态表示着领悟的程度；尤为传神的是那个代表芸芸众生的小顽童，公然举手提问，一下子把一个严肃的讲经说法场面，点缀的活跃起来；比较冷落的是那四大天王，他们威武地站在佛坛四角似乎被讲堂所遗忘，其实略加分析就能发现，他们是在恪尽职守地“护法”。所以“佛说法图”之说不仅符合场景，而且能与整个薄伽教藏殿的大环境相呼应。

薄伽教藏殿是佛教的图书馆。薄伽，是梵语“薄伽梵”的简称，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九佛号（佛有十号）；薄伽教，就是佛教；薄伽教藏，就是佛教的《三藏》；薄伽教藏殿，就是收藏佛教经典的殿堂，实质上就是佛教图书馆。这里殿内四壁，环列着别致的藏经柜，而取代了壁画。这里的藏经柜是很值得一提的艺术珍品，它是仿辽木构建筑的“小木作”，为二层楼阁式，下层是藏经柜，上层乃是供佛龕。这个小木作竟然做出了斗拱、栏板等复杂的摹刻品。据统计斗拱达18种之多，而且有辽代最复杂的“双抄双下昂七铺作”斗拱出现；栏板有几十种，图案个个不重复。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后壁（西壁）的“天宫楼阁”，真有那种“复道行空，不霁何虹”的感觉。这内墙一周的小木作实在称得上是巧夺天工。这些“小木作”与“辽塑”是下华严寺值得骄傲示人的“双壁”。

这里口口声声把下华严寺的大殿称做“薄伽教藏殿”，是来源于殿门上面的那块四方大匾。匾字为竖式直书，字大如斗，左末落款时间是清代康熙年间，显然是清代人的题名。尽管它与金代大定《碑》的“薄伽藏教”有一字之颠倒，

但画龙点睛,所以被人们认可。

下华严寺的小院落,乃是被挤压的结果。大约自 20 世纪以来,占寺院建学校,形成风气,此寺西部的天王殿及逸西的北面小配殿,建成了“下寺小学”(曾又称“实验小学”)。今天的“大同市博物馆”就是沿用了小学校的旧址。由此寺院的院落倒成了小巧玲珑的“祇园精舍”。虽然有点滑稽,但却正是它的沧桑。

下华严寺院外北面,有“海会殿”遗址。该殿为辽建,南向,面阔五间。梁思成先生当年测绘过此殿,认为是相当有价值的辽代建筑。可惜的是近年却被无知的小学教员所拆毁,现在只留下大殿台基供人凭吊。

二、辽金两朝寺庙开

大同这座“华严寺”的名称,最早出现在《辽史·地理志》,即:“清宁八年建华严寺。”辽时只称“华严寺”,而在寺内现存的金、元、明各代碑文中,又多有“大华严寺”的字样,因此称“大华严寺”是金代以后才出现的。从名称的变化上,可以看出辽、金两代的华严寺是有所不同的。概括而言,辽代的华严寺是由皇室初创,到金代才由僧团完善。

这段历史还必须说说清楚。

有关辽、金两代建寺的时间顺序,整理资料如下:

1.《辽史·太宗本纪下》记有会同元年(938),后晋石敬瑭派遣赵莹,向辽国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大事。从此大同(云州)划归辽,而后又归金,两朝占领达 300 余年。

2. 据薄伽教藏殿之梁上题记,该殿为辽重熙七年(1038)建。

重熙,是辽朝第七代皇帝兴宗耶律宗真的年号,重熙七年距辽朝立国(自太祖耶律阿保机记起)已130余年,此时的云州(大同)在契丹人心目中,还没有像幽州(燕州)那样,上升到陪都的地位(幽州在割让的当年938年就“升”为南京)。98年后在云州建殿,是因为他们在山西刻成了“辽版大藏经”即《契丹藏》,需要有几处像样的地方保存,恰好云州城内“舍利坊”有舍利塔的残塔基闲置,可以建成一处理想的存放地点,于是就利用这个方形的“九尺高台”,按照他们契丹人的习俗,建起了“东向”的“藏经殿”。由此这个殿也就成为“华严寺”的第一个建筑。不过建殿的重熙七年,这里还没有叫做华严寺。至于当时此殿是否就已经被命名为“薄伽教藏殿”尚不清楚,但这个名称与这个殿的功能始终是一致的。

注:舍利坊,见《大同县志·营建·华严寺条》“其地旧名舍利坊”。但没有说明这个“旧名”始于何时,不过可以肯定是早于辽。这里是由舍利坊之名而推理:那就是坊内必有舍利塔,而且该舍利塔到了辽时或已圯毁(估计拆除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契丹人更信佛)。正是这个残留的塔基,引起了契丹人的注意。

3.《辽史·地理志》载:“(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为西京,府曰大同。”这一年距辽朝立国(907)已经过了137年;距石敬瑭割让云州和幽州升为南京,晚了106年;比薄伽教藏殿建殿还晚了8年。时间虽然晚了些,但它的规格不低,即《地理志》所谓:“辽既建都(指大同为西京),用为重

地，非亲王不得主之。”地位之高，大有超过南京幽州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有许多历史、地理、军事等因素，这里不再赘述。做出这项重大决策的是辽朝第七任皇帝耶律宗真。

4. 而尤为出人意料的是辽朝第八位皇帝，道宗耶律洪基。在大同升为西京后的 18 年，居然要在这里为他们契丹人的祖宗建立宗庙。《辽史·地理志》载：“清宁八年（1062）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这件事对辽王朝来说可是一件大事。契丹人的祖宗、辽皇室的宗庙，既不选择他们的东北发祥地上京，又不选择另外三个基础较好的陪都，而是选择了提升陪都不久的大同。这就意味着要远离东北故土，要在千里之外，为他们的祖宗亡灵安家落户了。所为何来？对这种举措自然有一番背景和用意，可惜史料不详，使我们难以判断。惟一的一点线索是这位道宗皇帝“佞佛”，到底是大同舍利坊的寺庙风光感染了他，还是他们 24 年前建的薄伽教藏殿触动了他的灵感，或者是舍利坊内那座巍峨的五级浮屠震撼了他？还得仔细分析。

让我们剖析一下耶律洪基。他自登基以来干的几件所谓大事：《辽史·道宗本纪一》记：“（重熙）二十四年秋八月乙丑，兴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哀恻不听政。辛卯，百僚上表固请，许之。”正史一开张就刻画出一个孝子姿态。接着于八月的“辛丑（日），改元清宁，大赦”。九月、十月两月处理了些琐碎小事，随后“十一月甲子，葬兴宗皇帝于庆陵”。过了 9 天，“壬申，次怀州（上京临潢府附近），有事于太宗、穆宗庙”。又过了 3 天，“甲戌，谒祖陵”。又过了 5 天，“戊寅，冬至，有事于太祖、景宗、兴宗庙。不受群臣贺”。这就是这

位道宗皇帝即位后三个月的一系列大行动,可以说是不务正业,只管祭祖、谒陵。前后 17 天,走了四个地方,真是不避艰辛。此后这位皇帝依然是把祭祖、谒陵作为主题,如清宁二年(1056)“五月戊戌,谒庆陵。甲辰有事于兴宗庙”,接着“九月庚子,幸中京,祭圣宗、兴宗于会安殿”。清宁三年(1057)“五月己亥,如庆陵。冬十月己酉,谒祖陵;庚申,谒让国皇帝及世祖庙。”清宁四年(1058)“夏四月甲辰,谒庆陵”。清宁五年(1059)“冬十月壬子朔,幸南京,祭兴宗于嘉宁殿”。清宁七年(1061)“五月丙午,谒庆陵”。

这期间,即清宁二年建佛宫寺释迦塔(即应县木塔)。塔高廿三丈,台基高丈二,工程浩大。又表现了他崇佛的心情。

耶律洪基即位七年来,谒陵、祭祖,遍及四京,惟独没有到过西京。于是在清宁八年(1062),下令“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只是这道命令没有月份,由于记载的笼统,难以确定这一年到底是开工,还是完工?但是从同年十二月“癸未,幸西京。戊子,以皇太后行再生礼,曲赦京师囚”的记载来看,知道这位道宗皇帝寒冬腊月来到了西京。来干什么?史无明记。只知道五天以后他为皇太后行过“再生礼”,并赦了西京之“囚”。都是一些大事。所以不能排除前四天重点是“祭祖”。这就意味着“华严寺”已经建成,“诸帝的石像、铜像”也已经“奉安”。为隆重祭祀,整整忙乎了四天,才能办另一件“再生礼”大事。可惜对这次隆重的祭祀大典没有文献记载,这里无法描述。只是能够说明华严寺落成了。据此可以反证清宁八年的建华严寺令是

在年初下达的。而且是在一年以内完工的。这次的工程量不是很大。充其量只能建成“石像、铜像”之宗庙殿(东向殿)和“饭僧”之斋堂(海会殿),但是华严寺的总体布局(东向品字形布局)基本确定了。它的主体建筑是利用了一座古塔,该塔原来是四方形、南向,这次仅仅改变了一下登塔的台阶,变为东向,并引出中轴线。其右下(南)即薄伽教藏殿,其左下(北)即石像、铜像殿。既符合“对称”格式,又符合“左祖右社”礼制规范。至于辽时的华严寺内还有什么建筑限于文献、遗迹的阙如,就说不清了。如今仅仅知道海会殿一项附属建筑。

5. 不过,“海会殿遗址”值得注意。这是一座面阔五间的大型建筑的遗迹,原建筑经梁思成先生鉴定,是典型的“辽建”,而且建筑结构的学术价值很高。梁思成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说:“数年来,社中调查宋辽金遗物多处,屋顶形式以‘四注’居多数,‘歇山’次之,独无‘挑山’者,有之,白海会殿始。”仅就这个辽建中少见的“挑山屋顶”而论,就弥足珍贵了。可惜近年被无知地拆除了。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该殿在辽代华严寺的“东向品形”建筑群中,突兀而来地呈“南向”,所为何来?首先,就凭此殿在这个建筑群中独呈南向,它就既不会是佛殿,也不会是宗庙,而是另有功能。分析下来应该是“斋堂”。这从辽道宗的佞佛癖好上可以找出线索,《辽史·道宗记》说他“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在他着意的华严寺内,是不会放弃“饭僧”(即赐予僧人斋饭)的。这个面阔五间的斋堂,正是为了这种需要而建。取南向,既区别于这里

的佛殿和宗庙,又能良好采光、取暖,可以一年四季“饭僧”。再从舍利坊西部还有“八乌图井”配套来看,华严寺的“饭僧”量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个“八乌图”显然不是汉语,而蒙语、满语都没有这个语词,所以先可以排除是元代或清代所凿之井;有猜测契丹语中有近似此音的语词,若是,则不仅可以判断凿井是在辽代,还可旁证辽代华严寺的“厨寮”是在“宝塔”以西的西部寺区(如此则金大定碑所记金灭辽战役后,幸存的“斋堂”、“厨库”、“宝塔”、“经藏”都能得到落实)。后世称“斋堂”为“海会殿”,表达的意思是海纳众僧时,斋饭是必不可少的。

6. 这里还得注意一下“再生礼”。辽道宗这次在西京行这个大礼,与在华严寺安厝祖庙有密切关系。据《辽史·礼志》所记大致是:辽国的先祖,阻午可汗,秉承箕子遗风制定了“再生礼”,内容是皇帝在12岁时,为回报父母之恩,要行此大礼。礼仪的过程是“皇帝拜先帝诸御容,遂宴群臣”。《赞》云:“再生之仪,岁一周星(12岁),使天子一行是礼,以起孝心。……终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庙。”这和道宗西京之行,完全一致:他在华严寺参拜完先帝诸御容,做到了“敬承宗庙”后,举行“再生礼”,顺理成章。但是蹊跷的是,道宗这一年并不是12岁,他已经39岁了。为什么偌大年纪还要做此小儿行为?只能说明,西京华严寺的宗庙太使他激动了,促使他要表现一番“孝心”。意犹未尽,随后还“曲赦”了西京之“囚”。

7. 辽道宗这次西京之行,华严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回去后,于咸雍四年(1068)御制《华严经赞》;又于咸雍八年

(1072)以御制《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几乎成为“华严”专家。又过了一年,“咸雍九年(1073)冬十月,幸阴山,遂如西京”。这是他 11 年后第二次来西京,这次来,一方面是祭祖,更主要的恐怕是要存放他的大作《华严经赞》、《华严经五颂》于薄伽教藏殿,以企图纳入《契丹藏》。

以后直至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辽朝灭亡,五六十年间,大华严寺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估计是祥和的圣地。所以天祚帝在亡国之际也要力保西京,其因素之一与宗庙有关。

8. 金灭辽,保大之战,西京是最后的决战地。关键的“西京争夺战”涉及大华严寺。先让我们叙述一下“保大之战”的“西京高塔争夺战”。

话说保大二年(1122),金大将宗翰、宗雄、宗幹三路大军逼近西京。辽将耿守忠率大军援救。两军会战于西京外围。宗幹从中路冲击,其余大军弃马步行,从旁袭击,声势极胜,耿守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大势已去。守卫西京周围的辽兵大部投降,小部逃入西京城内,与城内守兵“又复聚集”,再作抵抗。于是展开了西京城池争夺之战,辽兵坚守不屈,而金兵志在必得,这场争夺战真是惊心动魄。先是守城辽军占据“城西浮图”为制高点,“下射攻城者”,金兵“士卒多伤”。完颜阿骨打的二皇子宗峻,冷静地观察后说:“先取是(指塔),则西京可下。”于是金大将幹鲁、鹘巴鲁,以相当大的牺牲代价夺下这个浮图,然后“复以精锐乘浮图,下射城中,遂破西京”。这个浮图,就是辽华严寺的中心“宝塔”。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决定西京命运,同时也是决定辽

朝命运的恶战，却发生在神圣的宗庙、佛坛、宝塔之下。辽败了，金胜了。辽皇族的祖宗——那些石像、铜像，怎么样了？佛坛、宝塔，怎么样了？

还好，女真人总算对得起他们东北老乡契丹人，在这里，尽管把个华严寺毁了个千疮百孔，等于毁了契丹人的宗庙，但是，那些铜像、石像并没有流离失所，先是由金僧人作了安厝。43年后，也就是大定六年（1166）五月，金世宗来到西京，“幸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诏诸僧谨视之”。这就很够意思了，灭国而不毁宗庙可以算是“东北风格”。此刻尽管辽朝的宗庙殿毁了，但铜像还在，下令僧人保护，意义可就大了。不仅承认了重建的“七间之殿”，还把华严寺的“寺庙文化”又延续了几百年。清道光《大同县志》之所以能够记载“铜石像，在舍利坊，《辽志》：清宁八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石像五、铜像六，内一铜像袞冕垂足而坐，余俱常服”这段文字，关键就在金朝的这一次保护。凭《大同县志》这段记录，能使人感觉似乎这些铜像、石像流传到清代还在。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9. 金大定二年（1162）《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殿记》碑，记述了金灭辽战后40年，重修大华严寺的来龙去脉。其中提及金灭辽当年战后华严寺的惨状：“至保大末年，伏遇本朝大开正统，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唯斋堂、厨房、宝塔、经藏、洎守司徒大师影堂存焉。”这几句简单的记录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历史的记录，能使人们较为准确地分析辽金两朝大华严寺的变迁，而且能引导我们考证辽金建筑的兴废。这里非常宝贵地记录了战